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八四期 ——
(二〇〇二年三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203a)

【追根溯源】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 (一)	戴 煌
【往事追忆】王若水与毛泽东	张敏采访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 (三)	周孜仁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追根溯源】

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 (一)

• 戴 煌 •

〔本文节选自戴煌：“‘造神运动’的教训——为庆祝新中国五十华诞而作”，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

◇ 1959年的庐山会议

为了纠正造成此等险象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1959年7月2日，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始的议题是总结经验和纠正错误，毛泽东定调“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但大多数与会者的心态并不这么乐观。有材料反映，很多省市的中层干部认为：“大跃进”是吹起来的，是浮夸、谎报的结果；“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粮食、副食供应紧张，就是根本没有“大跃进”的证明；“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群众不是自觉入社，是被强台风刮进去的”；“公社是空架子，是金字招牌”，“是根据上级指示人为的产物”……所有这些事实都充份说明，“三面红旗”违反了客观必然性，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成了盲目发展，冒进了”。

这样，不少与会者在小组发言或私下交谈中，也大体反映出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声和自己相类似的见解，希望党中央能够迅速消除这种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面。如此自由漫谈，畅抒己见，人们称为“神仙会”。

可是，柯庆施、康生之流却在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他们对自己在1958年兴风作浪、迎合抬轿，不仅没有丝毫内疚，反而打着保卫“总路线”、拥护毛主席的旗号，要将“神仙会”变成“护神会”。于是，会上突然出现了某种并无文字规定或领导明言的压力，加上“反右”的阴影，使得一些人甚怕某句话说得不妥当或太尖锐而遭遇不测，因此名义上是响应“成绩说够，缺点说透”的号召，但真正说到缺点时，只能蜻蜓点水，到皮不到肉。

一贯艰苦朴素、关心人民疾苦的彭德怀元帅，面对会场上的这种消极气氛，心里有点憋得慌，觉得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学海瑞。尽管他在西北小组会上已作过7次发言，甚至已谈到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作决定而是个人决定，不建立集体威信而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并且他还特别指出：“‘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但比起下面的实情来，他仍觉得言犹未尽。他觉得，如果那些“左”的东西得不到纠正，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如果在会议上提出这些问题，也许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请毛主席出面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得到纠正。于是他决心给毛主席写一封只供主席个人参考的信。

这封信写得很委婉，首先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列举了工农业增长数字与速度，“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基建项目过多过急了一些，“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关于公社化中的问题，经过中央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关于全民炼钢，虽多办了一些小高炉，浪费了一些人财物力，付出了一笔学费，但也是“有失有得”的。至于“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其中有这样一些字句：

“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这封信于7月14日下午呈送毛泽东。

应该说，无论动机与内容，此信是无可指责的，何况他也检讨了自己。

但是，毛泽东却对彭德怀在中央会议上直言批评“缺乏民主、个人崇拜”等等耿耿于怀，遂把这封供他个人参考的信，于7月16日标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决定延长会期，把原来没有参加会议的林彪、彭真、黄克诚等人也召上了庐山。

这时大家还不理解毛泽东让大伙讨论彭总的信是何用意，更没想到这会演变成一场“阶级斗争”的风暴。所以在6天的讨论中，大多数同志都赞同彭总的一些看法，还说了许多相似的事例。就是在华东组，也只有柯庆施等个别人阴阳怪气地说，就某一部份来说是有失，但就整个情况来说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得有失，而是得多于失；同群众的关系也不像有些人谈的，紧张得那么了不得。但接下来，也许由于毛泽东召集各大区负责人开小会得了风气之先，柯庆施等人再在小组会上讨论彭总的信时，就突然声色俱厉地说这封信的矛头是针对毛主席的，是说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

这时会上又突然传言，说彭德怀在拉队伍，中央书记处的半数成员都被拉过去了，还说彭老总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等等。

7月21日，张闻天在华东小组会上发言。他虽然同意会上印发的《议定纪录》草案所说，产生缺点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缺乏经验；但他认为不能以说到此处为满足，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和作风上找原因。他说：

“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大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一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呢？这也不一定……”

“总之民主风气很重要。要造成一种生龙活虎、心情舒畅的局面，才会有战斗力。过去一个时期就不是这样，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

应该说，张闻天的发言也和彭老总的那封信一样，表明了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完全符合党章规定的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的要求。但是，他们都被看成是对毛泽东的严重挑战。7月23日早晨，大家突然接到大会通知，听毛主席讲话。根据李锐同志的记录，这次带有家长风度的毛主席一上来就没好气。他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他说，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说没有什么可紧张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去年（河南信阳地区遂平县）查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3000人参观，3个月30多万人。听说（河北）徐水、（河南）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参观。其中多是县、社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

在大讲了一通有关“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问题之后，毛泽东又批“有失有得”的说法。他说把“失”放在前面，那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他说这些“右起来的”人重复了1956下半年和1957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

他说关于要快这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啊！

人们一听就明白，这一席讲话，主要是对准彭老总信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与“有失有得”的字眼来的，甚至认定把“失”放在前面也是别有用心的，而不问写信的动机与信的整个精神。同时，毛泽东还说，他青少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他现在也不放弃。谈到责任问题时，他说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在我。我要搞1070万吨，从此闯下大祸，9000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补贴40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很多人认为，彭老总泛指1958年的“大跃进”等等的急躁冒进，是有些人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

不过是形容、比喻而已，何罪之有？再说，一位同志在一篇文字、一席讲话中就算有个别字眼不那么妥帖，犯得着如此大动干戈么？如果说，个别词语不妥就是犯了天条，那么毛泽东在以上讲话中说马克思也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又该当何论？

何况，说党内一些人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发明权，并非彭老总而恰恰就是毛泽东。1953年8月12日，他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这样说：“我们说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党内的反映。”（毛选五卷91页）他当年这样说，全党没有任何一位同志有过异议，而彭老总时隔6年借用一下就成了罪过，显然是因为这次触及到了“神”的面子和尊严。

所以，他叫大伙“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并宣布散会而去睡觉之后，聆听讲话的很多人好像挨了晴天霹雳，不知所措。从此，本来想在某种程度上纠“左”的庐山会议，立刻转化为一场批判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7月26日，又传达了毛泽东的新指示：“对事也要对人”；而不再是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对事不对人”，于是批判的语调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上纲上线，其高度令人不寒而栗。

7月31日和8月1日，在彭真、彭德怀等人列席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对着彭老总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你说发表你的信你不高兴，不一定吧。写这信的目的就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

在又一次讲话中，他竟把彭老总的问题提高到“敌对”的程度：“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基础不懂，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你如果承认是经验主义，那就是同马克思主义敌对，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就是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我同你历史关系，这么多次，你每次动摇，昨天朋友，今天敌人”；“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言为心声，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一部份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你要打无产阶级的旗帜”；“华北座谈会，操了40天娘；补足20天，这次也40天，满足操娘，操够”。

在这次常委会上，林彪也讲了话并在毛主席讲话时多次插话。他声色俱厉地斥责彭老总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旧军阀”，他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8月2日，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讲话说，现在有一种分裂倾向，“现在庐山会议，这个时候，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倾，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领导机关、向6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问题”。

8月4日晚，林彪向晚上山的人传达常委会的情况，主旨是说彭德怀反毛主席，反对党的领袖，说彭德怀的信埋伏着修改总路线、动摇总路线、推翻总路线的观点，彭所说要提倡勇敢说话，就是要提倡赫鲁晓夫攻击斯大林的精神，并把他在常委会上当面对彭老总的责骂——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非常嚣张，野心很大，总想作一个大英雄、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留芳百世，等等，重复了一遍。

这个所谓的通气会，林彪在约两个小时的讲话中，没有称呼一声“彭德怀同志”，而全部以“他”字代替。

按照毛泽东和林彪的调子，各小组分别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批判的内容远不止彭总的那封信，而是任意引发延伸开去：一方面，“清算”他们几十年来在党内历次斗争中的所谓“路线错误”；另一方面，严查所谓“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和揭发批判前期会议发表过同意彭总言论的人。这正像孔老夫子早说过的那样：“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即善于逢迎谄媚），友善柔，友便佞（即善于言辞取媚于人），损矣。”毛泽东恰恰很欣赏这“损者三友”和违心认错，使党内高层的民主生活和原则空气又一次遭到严重的破坏。

8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当通过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时，全场鸦雀无声，气氛异常紧张。毛泽东亲自念完这个决议后，问有没有不同意见，没有人应声，也没让大家举手，就宣布通过了。当时许多久经革命斗争考验的领导人，似乎都还受到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树立和维护革命领袖的权威，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紧跟党的领袖才能保持党的团结。”于是大家都“顾全大局”，只好随着毛泽东的指挥棒转了。

大获全胜的毛泽东跟着作了长篇讲话。他说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大的成功，要彭黄张周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说：“如要讲个人独裁的话，如在王明与毛泽东之间选择时，我投自己的票。因为我看清楚了，你王明那一套，第一次是冒险主义，第二次是投降主义。在王明、毛泽东之间选择，彭大约会投我的票。如果彭德怀跟毛泽东较量呢？就会觉得与其是你，不如是我了……”

全会闭幕的第二天——8月17日，由毛泽东主持，还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作了主要发言，林彪也在这次会议上被定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

意味深长的是，刘少奇在讲话中似乎忘了他三年前在“八大”一次会议做的政治报告中赞扬苏共二十大的反个人崇拜的内涵，而大谈反个人崇拜是错误的。他居然说：我们中国党，中国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如果还不满意，还要更正确一点，既不“左”，又不“右”，那么，请马克思、列宁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看也许可能更好一些，也不见得，也许更坏一些。

他还说：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倡某些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党要有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运动，赫鲁晓夫搞这一手，我看也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不应该那样搞。所以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这样的讲话，无异于为中国的进一步造神运动增加了热度，也为他本人后来的大不幸埋下了隐根。

◇ 在越纠越“左”的灾难中，全国饿死几千万人，超过了八年抗战的死难人数

庐山会议后，全党不但停止了纠“左”，而且立即展开了一场不亚于“反右派”的声势浩大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在全国继续进行经济上的持续“跃进”，给“左”倾狂热火上浇油。“阶级斗争”也随之升级——全国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多达三百几十万人，超过1957年“右派分子”总数的五、六倍之多，这又一次扼杀全党和全国民主生活的结果是，再也没有人敢公开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问题，使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更加突出。

完全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吹牛说大话、蒙骗全国与全世界的所谓“向世界宣战”的新闻连连飞出。8月28日——庐山会后第十二天，新华社就吹牛说，全国人民公社健全发展，稳如泰山，二万四千多个公社全部巩固，参加公社的农户达一亿二千多万户，占全国总农户99%以上，不久，广西日报仍然发表该报记者与新华社记者的报导，说什么又出现了亩产13万斤粮的“高产卫星”。这些都想“证明”人民公社有着无穷而强大的生命力。

但10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号召继续发动群众掀起更大高潮，迅速超额完成农产品收购任务。这表明农民手头的粮食已经很少了，收购任务很难完成了。12月20日人民日报报导：河南马村公社社员高保先和徐冠卿，创造的从玉米穗包皮中提取淀粉已成功。这说明农民们已无粮果腹，只得从谷皮、包米穗皮上榨出些“油水”来维持生命了。据后来查明，195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1958年实产的4000亿斤少了600亿斤，仅为一再向下调整的产粮计划的62%；但根据下面灾难性的

浮夸虚报产量而确定的收购量，却比上年增加了14.7%，这就使已陷入饥饿的全国农民雪上加霜。然而1960年元旦人民日报在题为《展望六十年代》的社论中，仍说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在新的十年里，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超英国（不再说“三年超英”了），基本上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60年1月7日—17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会议仍然估计，1960年将比1959年更好的大跃进，仍然制定计划产钢1840万吨的高指标，并提出8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

这种完全脱离实际、不顾人民死活的胡思狂想，使得1960年的农业继续减产，工农业总产值比已经大幅度下降的1959年又下降了12.6%，其中粮食减产530亿斤，即总产降至2870亿斤，轻工业总产值也比上年进一步下降了。从1960年第二季度开始，连北京在内的许多大城市就已挖空了粮食库存，全国实行口粮低标准和“瓜菜代”，主要商品都实行凭票凭证限量供应；全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浮肿者普遍可见。就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表扬过的河南信阳地区遂平县的查岈山公社——全国第一个公社、放过许多“高产卫星”的先进公社，也难得吃口好饭了。同样被他在庐山会议上表扬过的河北保定地区徐水县——就是要在全国首先实行共产主义的模范县，第一书记张国忠也被逮捕了，说他欺骗了毛主席。

然而对中央的迅速超额完成农产品收购任务的号召，谁敢懈怠？吹牛说大话、谎报产量图虚名升官捞权的无耻之徒们，固然要施展其全身解数，就是没干过那些害民误国勾当的党员干部为保自身不被拔“白旗”、打“右倾”，也只好去尽量搜刮农民家里的少得可怜的口粮了。

在河南信阳地区，1959年一百多天没下雨，除了地区专员、地委副书记张树藩一人外，地委书记路宪文和其他7名地委常委都说这一年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是比56亿斤的1958年还要丰收的特大丰收年，仍要征购16亿斤，而真实产量只有20亿斤。所以秋收刚完，很多所谓的“共产主义大食堂”就断炊了，社员们只得偷偷地在家煮红薯叶和野菜度命。干部们发现了，就把他们的锅碗砸碎，迫使许多人只得逃荒要饭。地委认为这是给“三面红旗”抹黑，在各地路口设岗阻拦，并认为社员们将“特大丰收”的粮食隐藏起来而“反征购”，遂在全地区开展“反瞒产”运动。许多群众向河南省委写信诉苦，有的写信人被逮捕法办，是党员的被开除党籍。许多人因营养严重匮乏得了浮肿病去找医生治疗，医生们也不敢说这是饿出来的而只能说染上了“瘟疫”；有的医生说了真话，说“这病有两碗粥就能治好”，马上就被干部们扣上“恶意挑拨党与人民的鱼水关系”的政治帽子而被逮捕。为了不让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实情，地委让各县邮局“把关”，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就扣压了12000多封信。一个村的党支部23名党员饿死了20人，侥幸活着的三位党员给省委写了封血书，偷偷地跑到许昌地区去邮寄，央求省委救救他们村里的人民群众，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下，并下令查处。接着就在整个地区查找“隐瞒未报”的粮食，有些地方挖地三尺；实在查不到，就对群众捆绑吊打，施以种种酷刑。结果就是，查岈山公社饿死四千多人，占全公社人口的十分之一；信阳地区饿死一百多万人，约占全区人口四分之一；整个河南省饿死两百多万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河南上演的著名话剧《谎祸》，就历史地再现了信阳地区人民这种悲惨境地。

在甘肃省，在庐山会议上大批特批彭老总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指挥下，也在全省展开了“反瞒产”运动。单在定西地区的通渭县，有文字档案记载的刑罚，就有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40多种，与解放前国民党特务在渣滓洞、白公馆牢房里残害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的残忍程度几乎无二致。群众的点粒口粮被掳掠一空，导致全县27万人饿死或远逃他乡的达12万人。不但荒野饿殍被皮包骨头命在旦夕的人争相啖食，就是一个还能挑两小铁皮筒水的十岁上下的小男孩，也被其生身之父活活杀死了下锅，说是为救活这男孩的昏躺土炕生命垂危的生身之母和妹妹。结果这男孩被吃得只剩下一把细白骨之后，其母、其妹与其父也相继离开了人世。

在革命圣地陕北，1942年第一个唱起《东方红》而载入史册的名歌手李有源的家乡佳县，此刻也死了很多人，李有源的大儿媳也四出逃荒乞讨。许多饿得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社员实在没辙，一听说哪儿刚刚埋了死人，就纷纷去掘坟扒墓，把新入葬的棺材板刨了出来，打成板凳桌子等家具到城里去卖钱换粮，活一天是一天。

如果说，这毕竟是在经济滞后、地旷人稀的黄土高原地带，那么在长江沿岸人口稠密的鱼米之乡，也同遭这大不幸的恶运。比如苏北扬州地区宝应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中心根据地柳堡，就是著名电影《柳堡的故事》——几乎大家都会唱的“九九艳阳天”的那个柳堡，那个“风车转呀转”的美好境界，也饿死了414人，占当时全大队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超过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死于日本强盗和蒋介石军队的屠刀和枪弹下的总人数。整个宝应县境内也新坟累累，哭声不绝于耳。

同样，在鱼米之乡的安徽省，也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灾荒。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近年在《百年潮》发表的文章说：大灾荒时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高达三四百万，接近于人们传说的四百多万。

就是在得天独厚的首都北京，1961年秋冬之际，邓小平、彭真各指挥一个工作组，深入北京郊区怀柔县农村调查灾情，彭真小组下属的北京市公安局分组王金锐等人发现：所调查的几个村庄都有饿死人现象，平均约占人口的百分之五。这个分组原计划按常规到农民家吃派饭，给粮票给钱，但目睹各农户男女老幼都黄瘦如枯槁，根本无米可炊，只好各自从原单位搬来炊事员和粮菜自炊。此情在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也有所反映，成为“文革”打倒邓小平、彭真的“罪状”之一。

从1959年到1961年，神州大地究竟饿死和被折磨死了多少人，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

按说，既然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就应该向人民说真话、讲实情。可是，在“人民的大救星”的“英明”领导下，这一类事历来都是谜，人们只能私下众说纷纭。有的说死了三千多万，有的说死了四千多万，不亚于八年抗战死于日本侵略者枪弹、炮弹、炸弹和刺刀下的中国军民总数。就是按拨乱反正后官方的《中国人口年鉴》的“犹抱琵琶半掩面”的统计，1960年包括新出生的人口计算在内，全国还减少了1100多万人，1961年又继续减少了348万多人。

其间，党内许多有识之士作了农村实地调查，证明1960、1961年间的农作物产量、农村人口、耕地面积、牲畜、肥料和口粮，等等，与公社化前的1957年相比，甚至与初级合作化前的1952年相比，均大幅度下降；农业生产力和实际生产水平的几个主要指标，都下降到1952年以前；1960年的农村劳动力，少于刚建国的1949年。这充份说明，急冲冲地背弃了新民主主义而想一步登天的合作化、公社化和“大跃进”，实际上是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大倒退，并导致数千万人民的大死亡！

在30年代之初，斯大林强行集体化而造成的农业大衰退大饥荒中，饿死了五百万到八百万人，约占当时苏联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中国三年大饥荒中死了三千多万到四千万人，也相当于当时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真是旷古未有而又不谋而合的人间惨剧！

对这样一场千古大祸，不可能指望作为“首”的毛泽东会下“罪己诏”；其他的“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公仆领袖们却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公开站出来拍拍胸脯承担责任引咎谢罪！而多少年来，在我们称做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一旦发生重大事故、导致人员伤亡时，有关负责人引咎辞职、向人民谢罪或被法办者屡有报导，如几年前韩国汉城汉江大桥坍塌就是一例。甚至于，1995年日本神户大地震死伤众多，两名市政官员感到自己失职、对不起国家和人民而自杀。1999年8月土耳其西北部大地震，造成万余人死伤，土耳其报纸在指责政府时还引用了神户这两位官员的范例。应该说这些官员才真正是对国家与人民负责的。而我们这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正相反，一些人却绞尽脑汁地掩盖真相蒙骗人民，连篇累牍地宣传说这是“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其中新华社在1960年12月28日发出的消息就说：我国农业生产遭受特大天灾，一半以上农田受到程度不同灾害，其中三至四亿亩遭重灾。而根据20多年后的《中国统计年鉴·1984》所述，1959——1961恰恰是比较风调雨顺的三年，而粮食总产却由1958年的4000亿斤，依次锐减为3400亿斤、2870亿斤、2950亿斤。这更进一步证明，经过想一步登天、老子天下第一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大折腾，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遭到了极其严重的大破坏，人口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侥幸活命的

人由于食不果腹、无力从事繁重的劳动和无力抗拒少量的天灾，才导致粮食产量的大幅度下降、大家更吃不饱饭，全国才也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 刘少奇等人在“七千人大会”上拍案而起，但毛泽东很快又高高举起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刀子

如此严重的全局性的惨痛教训，该不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总结，以图复兴？按说完全应该。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新党章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这就是说，到了1961年，应该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了。也许由于“八大”之后这五年是个多事之秋，党内外积怨纷纷，召开新的代表大会不利于党的最高领导，所以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由于会议扩大到全国县委书记以上及许多厂矿企业的党委负责人共约七千多人，故又称“七千人大会”。

在这济济一堂的大会上，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并讲话，初步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基本经验教训。人们都还清晰地记得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最后还是盛赞“三面红旗”和高度赞扬毛主席的领导绝对正确，并说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必要的，对把彭老总等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也是举了手的；但他毕竟还是既有党性又有人性的人，面对国民经济的严重混乱倒退和人民群众的大批非正常死亡也不禁感到十分内疚，故在讲话中强调造成这种灾难性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同时认为彭德怀等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提出批评建议、反映实情，不能被认为是反党。

周恩来在会上也说：“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

很显然，这样的讲话都是针对毛泽东主席而发的。所以，尽管1962年元旦，人民日报的头版通栏大标题仍是“更高地举起三面红旗，在党和国家集中统一领导下，奋勇前进！”但到会的大多数人在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的这种启发带动下，终于能够面对现实讲真话，而冲破了所谓的“集中统一”的桎梏，纷纷指责这几年“左”倾冒险主义对党和国家及全国人民造成的严重祸害，要求为历次运动中被打击迫害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并有人提出给农民包产到户和经营副业的完全自由，以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能力，切实克服大饥荒、大死亡的凄惨局面。

尽管林彪、柯庆施、康生等极少数“左”派人物又在会上施展了各种招数，为毛大力解围，但面对会上的群情激愤，毛泽东在1月30日的讲话中也不得不强调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并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当众进行了一点儿自我批评。他承认这些年“作了一些蠢事”，承认“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然而他话锋一转，又不无牢骚地用他的老话“劝告”那些“左”派人物说，对大家的批评“要硬着头皮顶住”，“让人把话说完，天塌不下来，而不让人说话，总有一天要霸王别姬”。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遍游南北名山大川，自称“做了徐霞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重请陈云出山，主持计划经济管理工作。不管毛泽东此刻的真实思想如何，七千人大会确实在多灾多难的神州大地上吹起了一股温暖的春风，党内外有识之士也开始重新探讨从根本上铲除“左”倾毒素的途径。

2月2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将七千人大会没有涉及或尚未充分展开讨论的经济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尤其对经济困难局面作了充分估计。他尖锐地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2月23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的社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口号再度出现；各机关所办的学习班又开始各抒己见，有什么牢骚也可以发；农村中“包产到户”和“副业自由”等逐渐出现，对“右倾分子”和“右派”的平反甄别工作也着手进行了。

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不甘心于七千人大会后出现的宽松、民主、自由新气象的人们，只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沉默忍耐，就开始进行反击了。据近年杨明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口号的由来》、曹英的《毛刘分歧与‘文革’的发动》及其他有关文字的记载，在当年8月6日于北戴河开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竟和在庐山会议上一样，撇开会议通知的目前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粮食问题、商业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国家支援农业这四个议题，大讲“阶级、形势、矛盾”问题，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矛盾，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他首先提问：究竟有没有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不存在阶级？他说：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用？

接着他问：对国际国内形势究竟怎样看？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他认为：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工作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等等。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最后他问：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他自己解答说：一类是敌我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是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进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份农民闹单干。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闹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

这么一说，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许多人明显地感觉到，毛泽东提的这三个问题是有感而发、有针对性的。他们不得不迅速思考，也没有人敢于不认真地思考。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这三个问题，而且越讲针对性越明显。大家越听越感觉到，这矛头所向，就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春天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是一股“黑暗风”，就是邓子恢、陈云等人支持的“包产到户”的做法是一股“单干风”，就是彭德怀等人要求党中央重新审查自己历史的行动是一股“翻案风”。这就使会议重点成了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原定议题成了无关紧要的配角。

经过北戴河会议（8月26日至9月23日）的这种“思想准备”后，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又正式就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讲了话。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党的大会就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同时，他再次批判了“单干风”、“翻案风”和“黑暗风”。9月29日，人民日报在最醒目的位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写入了毛泽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基本观点，指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从此，“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不但响遍全国，而且要“年年讲，月月讲”，还加了一个“天天讲”，并且要坚决打退“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这样，毛泽东为了维护他个人的绝对权威，轻而易举地再一次借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越向前发展，阶级斗争越尖锐化”的逻辑，把全党全国的有识之士又一次压了下去。虽然过去，他历次讲话都是以党为核心而未以个人为核心，比如1956年8月30日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讲话时说过，“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毛

选五卷295页);1957年5月25日,在中南海草坪上接见当天闭幕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大会工作人员时又说过:“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毛选五卷430页)但是现在,他要以他个人为核心了。这使得很多人陷入了深沉的愁思。

果然,1963年2月金日成来访,毛泽东就对他说:“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我们同高岗、彭德怀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动摇分子总是会有。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那么回事……所以,要有意识地保持对立面。譬如,彭德怀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这些人总是想复辟的……”

“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会感谢你们的。”

此刻,高岗、彭德怀都早被打倒了。这里说的“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是些谁,那还不明明白白么?1967年2月,刘少奇被打倒了,毛泽东对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说:我们党内的斗争,多年来没有公开化,到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时,就看出问题来了,因此提出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法西斯式专政的国家。他并且说:“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好像中国真有人要搞政变,要夺他的至高无上的位置。

1964年11月,党中央就正式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的口号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其他工作的指导方针,而且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居于“以生产为中心”之前,被看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可以压倒一切。这使党内的有识之士无不十分焦虑地提着心:这是图谋清除庐山会议以后尤其七千人大会及其后所“暴露”出来的、对毛泽东的观点持异议者的强烈信号,一场摧残中华民族的更大的风暴必将来临……

的确,那个被定名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酝酿中!

(未完待续)

□ 摘自戴煌:“‘造神运动’的教训——为庆祝新中国五十华诞而作”

~~~~~

【往事追忆】

王若水与毛泽东

• 张敏采访 •

〔王若水先生不久前逝世,他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一文(载本刊zk9804a)是对文革根源分析最为深刻的文章之一。我们这里摘载张敏采访录“王若水与毛泽东”中有关文革的谈话,以表示对王若水先生的哀思。——编者〕

王若水:……一九六三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桌子的哲学》。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受马克思《哲学手稿》的影响,毛泽东看了以后还表扬我一番。这年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情,就是中共中央有计划地批判苏联的所谓修正主义,当时拟出了一些题目,其中有一个题目是批判人道主义,负责这一个课题的是周扬。周扬就找了一些人,其中包括我。为了批判,就得让大家看材料,因此就搞了一些书、一些译文,还有原版书,让我们知道西方是怎样讲人道主义的,西方是怎样讲马克思主义的等等。结果呢,我看了这些书以后,反而感到他们讲得很

多都有道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比起苏联讲的要深刻得多。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就是弗洛姆写的《马克思的人的概念》，他属于法兰克福学派，也是受《哲学手稿》影响的。在写作分工时，我被分配写“人性”和“异化”这两章。到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开始批文艺问题，火烧到周扬头上了，这本书就搁浅了，没继续写下去。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停止思索。紧接著，文化大革命来了。

张 敏：在这之前的很多政治运动，您是不是都能想得通呢？

王若水：过去有很多运动，一开始也想不通，但是慢慢就被说通了，总觉得中央不可能错，毛主席总是对的，要是有什么想不通，肯定是自己错了。但是，在彭德怀的事情上，我的确想不通，加上后来又有所谓“三年灾害”，饿死很多人，大家都吃不饱饭，更觉得彭德怀是有道理的。和很多人一样，内心同情彭德怀，但不敢说。

张 敏：您说内心同情彭德怀，那您当时是否认为毛泽东错了？

王若水：当时就是觉得彭德怀有些冤枉，不应该对他那样。但是说老实话，我们当时思想不可能彻底，想到这儿为止，不敢往下想了。如果再往下想，毛泽东为什么要整彭德怀，是毛泽东糊涂，还是另有原因呢？就不往下想了。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才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把问题想清楚。当时我们的思想受到很深的束缚。

张 敏：您说，遇到问题时尽量说服自己，相信党不会错，后来文革中，毛泽东提倡造反，您也曾受到鼓舞，后来您的想法有什么变化吗？

王若水：一九七一年林彪外逃，大家确实受到很大震动，的确想不到。因为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地位非常崇高，现在却成了一个恶棍。接着就是下面的问题：为什么毛泽东那么信任他？是不是毛泽东错了？我开始想这个问题。接着就是批林彪，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管《人民日报》。当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批林彪批不下去。批刘少奇的时候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可是要批林彪，照理应该批得更有力，但却冷冷清清。姚文元、张春桥这些人也没有下什么指示，上面也没有指示，究竟怎么批，没有人吭声。

周恩来指示说，《人民日报》应该批极左思潮，批林彪的左。我认为很对，林彪就是极左，应该批。过了一个礼拜，张春桥、姚文元跑到《人民日报》来，又讲了一通，意思是批左不要批过了头。当时，我们就很想不通，我们听谁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开始对张春桥、姚文元产生了怀疑，我索性直接写信给毛主席，向毛泽东告了张春桥、姚文元一状。没想到这封信捅了大漏子了。实际上，张春桥他们讲的是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看到我的信就表态了，毛泽东说：“王若水这个同志，我认识他，他写过《桌子的哲学》。他在信中讲要批极左思潮，我看也不高明嘛！”我心里想，我信中引的是周恩来的话，我说我赞成周总理。毛泽东批我，说我不高明，间接就是批周恩来，这给我的震动非常大，我原来作梦也没有想到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不一致。

接着就开始批我了，那是《人民日报》内部声势最大的一次运动，从报社的一楼到五楼，过道里、楼梯上到处都是大字报。我当时被迫作检讨，后来又被弄到农村劳动，一边劳动，一边还要作检讨。写这种检讨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每写一句批评自己的话，心里面就有十句反驳我自己的话，但又非写不可，实在难受。老实说，简直就是精神上的被强奸，心里一万个不同意，你还非得说自己无论如何都不相信的话，真是痛苦极了。那时候，我已看出毛泽东不喜欢周恩来，所以后来批周恩来是儒家，我就不感到奇怪了。我明白那并不是江青的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见。

张 敏：您经历了很大的起伏跌宕，在这样的打击面前，您内心是靠什么力量支持的呢？怎么能保持乐观？

王若水：一九七三年到七四年受批判的时候，那打击简直就是千钧压顶，沉重得简直承担不起了。那时候日子非常难熬，不是一天天熬日子，而是一分钟一分钟地熬日子。有时候，真觉得实在熬不下去了。这时候我就开

始懂得为什么文革中很多人自杀，的确是熬不下去了。虽然我不会自杀，那时就想走到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我了解你，你不是敌人，你是同志”，我就会抱头大哭。

那时候，我认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是坏人。有一天，为了一件事，江青发脾气，发话要批王若水。她的指示下到干校，干校一传达，气氛极为紧张。当时我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干校的领导就留了点心思，跑来让我和别人住在一块儿。我懂得他们的意思，是怕我自杀，但我拒绝了。那几天，我老是喃喃自语：“我要革命，要革命！”我是说革“四人帮”的命。他们当然不懂，以为我悔过。我的意思是我一定要和他们斗争到底。是这种力量支持着我，是马克思主义中正确的东西在支持我，使我能够坚持下来。有时回到报社，看到楼里满是大字报，什么“批判漏网右派王若水”等等。那时我已经被批得头发也脱了，背也驼了。但是，我大摇大摆地在大字报巷子里走过，仍然精神昂扬，无所谓，我蔑视这些东西。这种感觉是过去没有的，我百分之百相信自己没有错。

张 敏：那时候，在您面前展现的前程是什么？您当时的想法和在《人民日报》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

王若水：转变就是在一九七六年。一九七六年周恩来去世以后，清明节的时候，北京市民自发地到天安门去，贴诗、集会，人们都在那里集合。我有时也偷偷地跑去，一看：那天安门人山人海，人们都在那里骂“四人帮”，都在那里写诗。那时候，我心里本来有很多话不敢说的，可是到了天安门广场，你可以放心说，大家都同情你，大家都说江青很坏，张春桥很坏，都在那里骂。我第一次觉得，这是一个自由的地方。这让我想起几十年前，当我第一次从北平化装跑到解放区的情景。那时候蒋管区和解放区只隔一条河，过了河就到了解放区。我们这几个学生一过河就高兴的不得了，跳啊蹦啊，说：“我们自由了！特务管不着我们了！我们爱怎么骂蒋介石就怎么骂！”觉得那是非常自由的土地。结果呢，几十年过去，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多心里话不能说，唯有在天安门这块地方才有自由，周围的群众都和我一样，可以放心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中国的希望在这儿，在人民之中。

张 敏：这对您后来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有没有什么影响？

王若水：有的。使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尊严，精神上不应该被奴役，不应该盲目否定自己。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解放以来老是否定自己，每来一次运动，自己就批自己、骂自己一通，说如何对不起党啊，辜负了党的教育培养啦……现在我认为，是党对不起知识分子，是不是？共产党歧视知识分子、镇压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有独立意识。毛泽东讨厌知识分子的这种独立性，他们要消灭这种独立精神，但是人就是要有独立思想，这是最可贵的。

张 敏：当您看到共产党的错误，您对自己几十年投身的共产主义事业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王若水：毛泽东去世时，我发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怎么伤心。我倒感觉轻松了：这一天终于来了！原有的那种威慑力量现在不存在了！后来有一九七八年“真理标准”的讨论、“三中全会”等等，我们的思想越来越解放，越来越看清过去走了一条错误的路。当然，看清真相以后也有痛苦，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智慧的痛苦》，就讲的这个意思。我的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么一个事业，而这个事业实际上是基于一种错误的理论。当然，仅仅简单谴责是不对的，我们走上这条道路也是有原因的，在开头不可能认识得这么清楚，经过这么几十年痛苦的教训，才开始不糊涂、才开始明白了。但同时就有一种失落感、幻灭感，有如大梦初醒。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糊里糊涂当然不会痛苦，但我们是人，应该有思想，即使痛苦，也比糊里糊涂的快乐属于更高的层次。

□ 摘自“王若水和毛泽东”，《民主中国》1999年第9期

~~~~~

【往事追忆】

红卫兵小报和我（三）

• 周孜仁 •

（续上期）

五，工人造反风潮

仔细浏览从创刊号到全市夺权之间的几期《8 1 5 战报》，你很容易发现，出现次数最频繁的内容就是：“红岩机器厂 8 3 1”造反派如何如何、通过他们的行动，真正的工人造反派应当如何如何，等等。

要说清红岩 8 3 1，必须从重庆的工人造反风潮说起。

重庆大学的造反行动一开始的口号就是杀出校门，走向社会。先是在各区，如江北、南岸、九龙坡、杨家坪等各地驻点办联络站，和当地的中学娃娃一起，开演讲会、搞辩论、表演造反舞、印发传单，诸如此类。少男少女们在一起，没老师、家长管束，爱怎么造反就怎么造反，很是快活的。当然有谈情说爱之类的风流快事，但是很少，珠胎暗结更没有听说过。记得我们班同学在重庆南岸 3 9 中驻点，一次放电影，有位仁兄忽然间春情难抑，动手摸了一中学女战友大腿。该女孩以大局为重，没当场呼救，散场后立即投诉于我班战斗组长，全班同学马上群起而批之。先颂读毛语录几页几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某条某款：“不准调戏妇女”，于是便定性了，结论是：将此一念之差的登徒子断然清洗出战斗团以正法纪，从此以后以至毕业分配，该可怜虫便孤魂野鬼，再无人愿与之理会，直到两年后发配边疆，他半个“不”字也不敢哼。那时候年轻人都觉得自己从事的事业是属于未来的，属于未来的事业都是很神圣的，它需要献身、禁欲和死亡，而不是尘世的欢乐。亚里斯多德评价柏拉图的《理想国》，有这样一段话：共产制度将人民投入一种难以忍受的密切联系之中；它使阴私或个性没有容留之地；它假设人人都具有只有少数圣人才具有的耐心和合作的美德。文革那会儿，年轻人都以为自己是圣人——这是另一个话题。下面继续说工人运动。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重庆市委马上诚惶诚恐地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进行贯彻，情愿或者不情愿地认真检讨前一阶段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开始被平反，整理、搜集的所谓“黑材料”开始被清退或销毁。这一下，聪明智慧的中国人算是搞清楚了：伟大领袖这一次显然不准备旧策新用：什么“引蛇出洞”、什么“搞阳谋”、什么“秋后算帐”，他统统不用了。林彪不是说过吗，毛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他的招数多得很。

于是，动摇、静观了好几个月的“工人阶级”终于蠢蠢欲动了。笔者查阅了1966年11月23日笔者所写的一篇文章：《重庆文化大革命的新任务》。在“伟大的转折”小标题下，对当时的形势有如下描述：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掌握了真理，明白了真相，于是便起来革命、起来造反了！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军成立了！红工 8 1 5 战斗团成立了！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军成立了！居民 8 1 5 战斗团、供电 8 3 0、红岩 8 3 1 战斗团、重纺 8 1 5 战斗团……都在革命的喊杀声中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这是一股了不起的力量！这是一支顶天立地的队伍！他们一登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舞台，就以无产阶级特有的高度民主觉悟、政治远见和坚强斗志表现了无穷的力量。所有这一切，标志着重庆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转向了新阶段，这就是，由 8 1 5 所掀起的山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由单纯的学生运动转向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

该文是笔者根据总团“勤务员”吴庆举授意写成的。在此之前，11月22日，吴曾亲自操笔写过同样意思的文章以指导运动，题目是：《杀出校门，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只是意犹未尽，文字欠煽动性，故而要我再写一篇。说写文章“以指导运动”，并非将该文章印成总团“红头文件”下发。不是的。造反派不需要“红头文件”。除了毛泽东诸人，当时泱泱中华没有任何权威。红卫兵连国家主席都爱怎么羞辱怎么羞辱，况论区区总团“勤务员”！当时战斗团的任何重大决策，都必须召开全体队员的辩论大会以作出决定。重大 8 1 5 的这种会议一般都在风雨操场或者松林坡礼堂召开。而大会从来都吵得热热闹闹乃至乌烟瘴气的。这种集会上，似乎人人都是

政治天才、智者、辩手和谋略家，都可以用滔滔雄辩让众人臣服，而只要一句话不对胃口，满场顿时就会起哄啸叫要你滚下讲台。吴庆举出身贫农，穷乡野地长大，自然比不得城里孩子那般伶牙俐齿，他明白自己的弱点，因此每次到辩论大会发表演说，总要事先写成文稿反复推敲，并总要让我为其润色。吴，四川遂宁人。父亲早年故世，由母亲一人将他养大成人，而且培养成大学生，足见其母亲的刻苦坚韧和勤劳智慧。吴正是从母亲身上遗传了这些优秀的特质，故而得以在风云际会的动乱中脱颖而出，成为喑鸣叱吒的好汉。他和我同在校业余文工团当点“小官”，他为乐队队长，我为美术队队长。二人多年邻室而居，是以成为莫逆，尤其我俩文革初期同受市委工作组压制，后又共同策划了重庆的815运动，更给两人关系赋予了生死与共的色彩。因为他出身硬朗，不似我后忧重重，于是一路冲杀，在重庆文革的舞台上演出了许多精彩有致的活剧：关于这一点，笔者下面还有记述。

还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重庆地区保守组织处境日蹙，加之工人造反风潮日盛一日，保守组织更有兵败如山倒之势了。各地办点的同学们觉得有些无事可干，便开始不耐烦了，甚而至于对总团过于刻板、正统的管理模式提出质疑，甚至主张：“815必须大乱！”，扬言：重庆文革要深入，“必须砸烂815总团！”云云。作为总团“勤务员”的吴庆举可是有足够耐心的。此人的特点就是成天忧心忡忡，主意迭出。恭维他的人，说他是“小诸葛”，小视他的人呢，就说他“多谋不善断”。不论褒贬，反正还上大学他就一头“少年白”：就凭这点，你就得对他的鬼点子服气。有了上面那些混乱认识，因此吴就大会小会地宣传“工人运动好得很！”，宣传他的走“129道路”，宣传他的“杀出校门，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招还真灵，很快便获得了全体同学共识。本来，“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这一课题毛泽东早已教导多年，对一代青年学生，可说是刻骨铭心，已经固化成为一种潜意识甚至本能。文革前夕，笔者曾去达县，即著名画家罗中立悉心描绘过的川北山区，参加了七个月的农村“四清”。在异常贫苦艰难环境里生存的山民，他们所表现的坚韧、朴直和厚道，确实让人感动有加，而同时，作为穷乡野地的小生产者，他们的狭隘、偏见乃至让人很感可笑的自私，对人也记忆尤深。但当时我们却不愿意想这些，即使看到了，想到了，也必然马上自警：快快刹车！这是知识分子的偏见作祟！毛主席教导我们：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还是“比知识分子干净得多”。文革之初，毛确实热情洋溢地鼓动红卫兵造反，可此后不过两年，即1968年7月27日，毛便怒气冲冲地将工、军宣队开进大学去教训不听招呼的娃娃兵了，并且降旨“无产阶级金棍子”姚文元，令其著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把知识分子和“那些患了近视症但还不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并称，一起加以“奉劝”：从此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全体蒙冤，当了整整十多年的“臭老九”。毛非常清楚知识及精神力量的可怕。读书人一旦较起劲来，坐牢、杀头、满门抄斩，甚至诛灭十族都面不改色。毛是不能让你翘尾巴的。还上大一，党史老师就给我们讲过延安整风，要知识分子“当众脱裤子，忍痛割尾巴”，要学会“夹着尾巴作人。”在毛看来，知识分子是某种尚未进化完全的脊椎动物，必须随时随地让工匠或者农妇对其进行圈养驯化。重庆无线电三厂一个叫黄仲勤的女工，派到重庆大学当工宣队员，天天把教授、学者召集起来学马列学毛泽东思想，其时她刚满十六岁。几十年后，我在深圳一间公司作总经理，她被聘为出纳，说起文革旧事，她自己都觉得荒唐透顶。

1966年的吴庆举绝对是毛主席的好孩子，815的所有同学也绝对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一听说要“和工农相结合”“向工农兵学习”，大家二话不说，背起书包就出发：下厂去、下乡去、下专县去。只是这一回情况有点见鬼：如今的大学生，毕竟已经和原来有点不同，毛泽东好像把他们宠坏了。他们已经不是原来那种傻乎乎的、只能任人教训的“没头脑”，他们已经见了大世面、经了大风雨，已经是天不怕、地不怕、敢作敢为的“革命闯将”。凭着几个月的革命经验，他们发现这些开始造反的所谓“工人”，尤其某些响当当的“工人领袖”，其实并不怎么样，并非毛告知的那样“最大公无私”“最有组织性、纪律性”，反过来，保守派骂他们“社会渣滓”、“牛鬼蛇神”、“三教九流”，还真有点那个意思。这问题其实很简单，在工厂里，劳动模范、先进份子、共产党员……这些人，好吃好在，备享尊荣，他干吗反呢？想反的，还不全是些受过或者正在受压制、冤枉过或者正在被冤枉的、平时吊儿郎当、经常被领导数落批评的主儿，按十多年根深蒂固的观点看来，他们当然不是好东西。

我姐夫就是重庆最先的工人造反派，按当时的说法，他也对社会有“不满倾向”。姐夫出身重庆的一个银行世家，大约家境优裕，因此性格洒脱不羁，火爆任性。重庆刚一解放，他立马投考“革大”，草草训练数周，便派赴川西藏族地区开辟工作。出发前回银行告别，他那一身皱巴巴的列宁装让昔日的同事们惊羨不置：哟！没

想到你老余原来是个地下党呀！我姐夫姓余，重庆南岸海棠溪，就数他们家族最大。

他满怀自豪地去了。到了雪山深处一个叫杂谷垭的蛮荒野地当了一名小小的财会人员。姐姐告诉我，说那个镇子不过十来户人家，买米打油需要骑着马向山外跑整整两天，相当荒远。不久就开始“三反”了。共产党的中央集权政府效率是很高的，北京一个喷嚏，连杂谷垭这样的地方也免不了感冒。“三反”有一反就是“反贪污”。山窝子里加上我姐姐这样的小学教员，吃官饭的也不过就十来号人。哪儿找清洗对象呢？领导绞尽脑汁左思右想，这小杄儿不就有个姓余的小子成天和钱打交道吗？这家伙自以为来自重庆大码头，傲气熏熏，有一次领导去信用社找他借电话打打他公然不买帐。他不贪污谁贪污？于是就抓起来。于是就开会斗争。你小子不承认啊？好办。捆起来：打！打不服？行，跪玻璃渣！跪你个双膝血淋淋。还不承认？好咧，吊起来，吊你个七窍断生气！那时候姐夫十八九岁，年轻气盛，可毕竟肉身凡胎啊，实在受不了，只好认帐：我贪了。贪了多少？胡乱说个数字。达不到领导期望值，于是又打、又跪，又吊。只好自我加码，一直加到领导满意为止。行了。又问：你贪的钱放哪儿了？能放哪儿呢？他的行李就一口箱子，早抄过了：一无所获。那时候，由杂谷垭到重庆远如极地探险，巨额贪污款想送回老家都不可能。他只好说：都送土匪了。行，有来龙，有去脉，事实清楚，案犯供认不讳：运动于是胜利结束。姐夫被投进了大牢：他不是钱都送土匪了吗，他理所当然和土匪关在一起。他是大都会来的白领呢，被抄的皮箱里，出发前他还傻乎乎地装了几套平时舍不得穿的西装和舍不得系的领带呢。他压根儿不知道在这儿是不需要穿西装的，更不知道他如此向往的新社会还要他和土匪一道领略雪山深处的铁窗风景。十多年后，回忆起那段日子他还心有余悸。他对我说，那些土匪真可怕呀！，一个个斜眉愣眼，满脸横肉，原来只是在美国的西部电影里见过啊！关了半年，查无实据，落实政策——我们党是很喜欢落实政策的——于是，放了。于是发回原籍，到重庆南岸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煤窑：涂山煤矿当起了矿工。原本在银行写字楼过得悠哉游哉的小白领，现在只能天天提一盏矿灯下井，黑不溜秋的，过着人称“埋了还没死”的日子。几十年后，四人帮终于倒台了，改革开放了，他接到一纸通知：那个遥远又遥远的县政府寄来的。感谢党，好歹算是寄来了。政府告诉他，说解放初那一回是搞错了，特此平反，并补发损失费：200元。那一年，姐夫已两鬓花发，年逾半百。他用那200元钱去买了一把当时特时髦的鸿运扇。他对我说：你看，你姐夫一辈子，就值得这一把电扇呢。

文革开始时他还不老，但生活却早把它折磨得万念俱灰。夫妻分居，他只能常年住煤矿的集体宿舍。那不叫宿舍，是上百人群居的大窝棚。上大学时，隔几个星期我总会去南岸看看他，而他总是沉默寡言，从井下省一个大号加班馒头让我吃，然后把我带到乱七八糟的铺位间绕去绕来，拣一个乾淨点的地方便囫圇睡去。那时候有部阶级教育片，叫“燎原”，描写旧社会安源矿工日子如何之凄惨。每次恶卧在涂山煤矿肮脏杂乱的集体宿舍，我都会想起电影里的布景。文化革命真够伟大的，不过短短数月，公然把我姐夫这样的人也鼓动起来了，成了最早的造反派。

我们家族中还有一位工人造反派，我的表哥。他是我舅舅的儿子。两房单传，从小受到的溺爱自然无以复加。小学时我曾和他同班，娃娃中间，他不待说是为王为霸的：闯了祸，反正有爹妈给他赔礼摆平。有时我去外婆家找他玩，稍有不悦，他向大人一告，结果总是舅母不问青红皂白将我训斥一通，继而“金生长、金生短”地将宝贝小子诤慰不止：“金生”是表兄的小名。如此任性娇惯的孩子学习成绩自然很难好起来，和我同班一期他便理所当然留了下去，而且后来还继续留：留得不能再留了，就只好参加了工作。先在砖瓦厂，后又去建筑队去当小工。文革来了，好得很。“有朝一日春雷动，得会风云上九重”。他没上九重，却当了个很实惠的小头头，腰杆上还别一柄盒子炮，很神气的。有一次我和他偶尔相遇——他是我的对立派——只是他全不像当时很多同志那样“亲不亲，阶级分”，为一个政治观点，一家人也会闹得反目成仇——他根本不和我探讨政治问题，而且他对政治问题似乎毫无兴趣。他很得意地告诉我，那位原本耀武扬威的街道办事处主任如今见了他是如何毕恭毕敬，还说他神气活现带着队伍去端某街道据点，仗刚刚打响，突然发现对方也有真家伙：他吓得如何魂飞魄散，拔腿就跑。

家族中所有工人中，只有成都的五姐夫是唯一的先知先觉。他是驾驶员，文化不算高，大约江湖上走南闯北，见识广，在全中国人民都被搞得如痴如狂的1966年秋天，他公然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红卫兵跳什么跳？全给人家当官的垫背。不信走着瞧，运动完了，鸡还是鸡，凤还是凤。那一刻，五姐夫的自信和固执

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下面还是说在涂山煤矿当矿工的姐夫。12月的某一天，他突然来到报社找我，我上大学五年，这是他第一次到重大来。他告诉我说他们造反了，要成立战斗队。工友们知道他的妻弟在重大，还是战报编辑，特地要他来邀请我前去参会。记得听到这一消息，我当时一点也不高兴。我知道我姐夫不是坏人，但理论上却属于社会的另类。我担心他的造反对于他，对于我，甚至对于整个815，都不是好事情。但我不能把这些说出来。见我喁喁难决，姐夫又讨好地怂恿说：不要紧的，你只要去主席台坐一坐就行了，什么话都不要你说。只要坐在那儿，保皇派一见重大815的人，心里就怕。我犹豫再三，让另一个同学：同我去北京告状的王太康跟我姐夫去了。回来，王对我说，你姐夫：亚克西（行）！

王当然不知道，两年后，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十二级台风”里，我姐夫果然被作为“牛鬼蛇神翻天”的典型被揪出来，关进煤矿私设的监狱里，一关又关了好几年，直到四人帮垮台之后才“平反”。

这只是发生在我小小家族里的故事，社会上工人造反者状况的形形色色有多精彩就可想而知了。对于在类似修道院环境长大的大学生来说，所有这些陌生的社会风景便显得有些猝不及防了。他们理论上可以接受所谓“工人阶级伟大”、“工人运动好得很”的结论，但面对千奇百怪的个案，他们不知所措。就在上面两篇文章发表后不到一个月，12月21日，《815战报》便急不可待地出版特刊，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关于重庆工人运动的几点参考意见》。其中观点当然不是报社自作主张，同样是在全团大会一片呐喊和啸叫中通过的，代表了同学们共同的忪忪忧心。文章煞有介事提出什么“必须纯洁组织”，“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钻入我们的阵营把我们内部冲跨”，提出什么“司令部要革命化”；提出什么“应该保持工人阶级勤劳朴素的本色，不要搞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设备”，文章甚至还书生气十足地搬出了在政治学习中辅导员危言耸听的训示：“现在，我们应当看到国家还不富裕，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在受苦，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远远没有完成，因此，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做牛马的时代，千万不要忘记世界上的阶级兄弟，一定不要贪图享受，要把世界革命的大旗扛下去，要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走到底。”这些喋喋不休的说教，不仅现在看来，就是在当时看来，也天真滑稽得可以。难怪人家要说重大815“右”了，成了“变相的工作组”，等等。不过客观地说，学生们在提出这些主张时候，他们是万般真诚的。

在这种局势下，作为领头羊的重大815，当然就急于要按图索骥，寻找工人阶级造反派的先进典型了。这个典型必须由真正大工业的产业工人组成，要有很多共产党员，有劳动模范，所有成员必须历史清白……总之，他们必须完全符合毛泽东所制定的无产阶级的技术标准。这样，他们找到红岩机器厂了。

六，关于红岩机器厂

重庆红岩机器厂是六十年代新建的内迁厂，位于远离市区的北碚区歇马场。生产船用柴油机。工厂人员由两个地方迁来：一部份来自于无锡某厂，另一部份来自洛阳某厂，两个派系的工人便组成了一个“双民族”社会，两个派系的头领便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中国人家乡观念无疑是非常要命的。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增广贤文》有云：“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此之谓也。如果说，老百姓为生活计，从五湖四海走一起来了，只用磨合磨合，最终也不难彼此融合。麻烦是当官的，因为权力诱惑，两帮人就很难尿进一把壶了。当然，如果上级协调得当，问题也不难解决，反正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问题是，上级委派来的工作组恰恰把屁股坐歪了：偏偏地坐到了洛阳派一边，事情就越搅越麻烦了。时间是文革初期，1966年6月8日。市委工作组是来搞所谓工厂“四清”的。事情还没“清”，市里的文革已闹腾得地覆天翻，心里憋了一肚子气没处发泄的无锡派工人，眼看得满重庆都已洪水滔天，学生又提供了现成榜样，焉能不闹？

这样，831事件作为重庆最早的群体工人闹事，便发生了。

关于事件的叙述，当年的文章是这样记录的：

“……由于工作队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地打击了群众革命热情……几个月来，把工厂搞得乌烟瘴气……八月十五日发生的‘八一五事件’把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上的斗批改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市委，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

“在这种情况下，市委下禁令、封消息……忠实执行市委反动路线的红岩工作队更是把该厂封锁得铁桶一般！

“但工人们迫切要求关心国家大事，纷纷要求到市里看大字报。在他们和工作队进行了一番艰苦的斗争之后，终于在8月31日，1000多人一起到市里来了……在市里，他们与总工会的一小撮保皇分子做了两天两夜顽强的斗争，并于九月一日胜利返厂了。这就是轰动山城的八三一事件。”

和当时发生的所有故事一样，“市委工作队”“急急忙忙在厂里拼凑了一个‘无产阶级红卫兵’（后改编成了全市性的工人纠察队）……利用围攻、斗争、盯梢、调职等手法，对‘八三一’进行了全面的镇压……”和其他工厂发生的故事不一样的是，在造反派连连得手之时，被市委支持的一派干脆撩掉摊子，拍拍屁股走人了：“工人纠察队在离厂的时候，把厂里的生产工具、保管室钥匙、技术资料等都统统拿走了，给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困难。比如：……车辆被全部开走了……变电所走了四分之三，锅炉房有一个中班走光了，水泵站人也走光，阀门也给锁上了。总机、机要室、武装部的护厂民兵等差不多走光，公章、公函、采购证等也统统锁上或带走……食堂炊事员走了40%……托儿所的炊事员走光……”

那年头发生的故事都是造反派快快活活地满世界捣乱而保守派忍辱负重地呆在家里搞生产，红岩机器厂恰恰反过来了。保守派心安理得出去上访问串联，而把双倍的生产任务留下来让无锡籍的造反派们慢慢享用。831的造反派们确实还蛮争气的，他们不但把生产坚持下来，而且确实还干得不错，据战报载，“提前七天跨进一九六七年”

继续摘引大段大段关于造反弟兄们“抓革命促生产”的事迹显然就太腻味了。当年的虚妄和偏见，如今早已冷却甚至已被时间的泥土深埋为一堆化石，那么今天，当我们拨开那些空泛响亮的政治外衣，该怎样解释他们确实让人感动的劳动激情呢？群体的荣誉感。我以为，这种群体荣誉感，实际上就是常言所说的爱国主义、民族情结这一类概念的微缩版。它已是一种超越经济和功利的文化现象。当经济的发展让千差万别的民族文化走向全球性的沟通与融合，六十年代愈演愈烈的中国阶级斗争却让本已相当狭隘的一国文化变得越来越狭隘。因为这已直接关乎这个群体、从而其中每一位个体自身的利益甚至生存。那年月，你的行为稍有“不革命”，对毛泽东稍有不忠，你的敌人就可以象掐一只昆虫一样，名正言顺、轻而易举地将你掐死。为了战胜洛阳来的对手，无锡人必须表现得比洛阳人更革命。

根据笔者的日记，我前后曾两次到红岩厂调查。第一次是11月28日至30日，日记有如下一行：“到红岩机器厂作了两天多的工厂调查，教益不小，写了关于该厂抓革命促生产的调查报告一份，拟送中央文革”“送中央文革”是怎么回事我一直不清楚。我只记得是吴庆举让我去的。造反派都喜欢把自己的事情说得非常神圣，有点像生意人都喜欢把自己的广告做得很响亮一样。吴作为总团“勤务员”尤其如此。大学毕业后，大约是1973年，他不知为什么突然受到市委领导青睐，派去南桐矿区当一个工作组的负责人，他公然兴冲冲地来信告诉我，说他正在读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谈到当年列宁在维堡区从事工运，列宁夫人说：正是那段经历，“使依里奇成长为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足见吴庆举把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想象得有多神圣。不过我只是个事务主义者，不管当时或者现在，我都料定815总团没本事和中央文革搭上热线，让这样的破文章也能直达天听。作为小报文章宣传宣传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反正印刷厂就在自己手上。于是毛泽东生日那天，我们将文章发在了《815战报》的第三期，题曰：“抓革命促生产的好榜样”。本文前面那些叙述就摘自该篇文章。

第二次去红岩厂就在第一篇文章发表当天。那天的日记也就一行：“我和吴庆举到红岩厂去了，中央要求我们再写一个红岩厂的调查报告”次日，27日的日记也是一行：“把第二个调查报告完成了，题目是：《闪烁着共产主义光辉的新事物》，由红岩厂的五名代表带上北京去了。”这个“中央”绝对又属于虚无乌有，如果说沾

一点谱，估计叫我写这篇文章是新华社重庆记者站出的招，因为后来，1967年1月11日，在新华社播发的一则消息中，确实用了约四百字的篇幅介绍“红岩机器厂革命造反派职工”提前完成生产任务的事迹。发表这则综合消息，是为了配合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给上海工人造反派的“贺电”，反对经济主义、打退所谓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虽然消息长度不足我所写文章的十分之一，但我们依然大受鼓舞，毕竟是新华社啊。毕竟是我们抓的典型啊。大约为了显示我们对此事的专利，第二天，即1月12日，我们马上以特刊的形式，全文刊登了上面那篇据说是“中央”让写的调查报告。

几十年后，我有机会调查很多当初工人造反的个案，七十年代，我本身就曾因为一桩莫名其妙的反革命案牵连而被弄到一个工厂当过多年工人。这个工厂在云南文革中也闹得特别起劲。我有意识地了解了很多工人的造反经历，对照之下，我以为红岩厂的情况实在没有太多典型意义，更有代表性的，倒恰恰是我那位当矿工的姐夫和那位从小不喜欢读书的表哥。比如，造反头目何某，原来在厂里当维修电工，一次，因机床限位开关质量出问题，机头从床身上冲了出来，于是厂保卫部门认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对之百般盘查，没完没了。还有一钳工，文姓，曾和我同一车间。五十年代一次班前会，他和团支书发生口角继而踢了对方一脚，团支书不依不饶，一状告到厂党委：文某立即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送去农场劳教十余年。下班返家，我俩常骑车同行，一次我问：为踢人一脚就劳教你十多年，觉得冤么？不料他豁达一笑，回答：我踢团支书一脚，就等于踢了共青团一脚；共青团是属共产党领导的，我就等于踢了共产党一脚；踢共产党一脚，就等于踢了共产党主席一脚；踢毛主席一脚才劳教十多年，有什么冤？值！文革开始后，工人们把平素威风八面的保卫科长揪出来批斗，戴高帽，挂黑牌——这黑牌可不是纸板作的，而是重达几十公斤的气缸盖！细铁丝挂起来，往科长脖子上一套，细细的铁丝便像刀刃剑锋一般直往肉里嵌，顿时嵌得鲜血淋漓！

这样的故事太多了！

红岩厂成为的造反派典型，还有一点让人费解的是：无锡作为著名的江南水乡，民风素多温婉娟秀，为什么偏偏让他们和“造反”这个往往意味着刁民枭雄的概念搅到一起？而不让同一个厂的、来自洛阳的北方人？这一回，红岩厂的文化大革命偏偏让强悍骠勇的北方人反串了一回保守派的角色。历史真正是开了一回玩笑。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红岩厂作调查的情景。在那个远离城市的工厂，活动于那些热情有加的造反工人中间，我没有感到过半点火药味，他们全都操着那么动听的音乐般的吴侬软语。接待我的工人，一位姓过，叫过文南，除了戏剧《十五贯》里那位叫“过于执”的混官，我是第二次遇到这个姓。过师傅精力充沛，一看而知具有南方人的精明。另一位是女工，我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只觉她眉清目秀，让人想起六十年代名噪一时的江南风俗画家徐启雄笔下的采莲女。她将我安排在不知谁的寝室过夜，事前将卧具全都换洗得干干净净，还能闻到淡淡的肥皂香味，刚刚钻进被窝，我突然发现：在雪白的被单上，她还用圆珠笔，认认真真地写了一行字：“向重大815小将学习、致敬！”——这个细节对我记忆尤深。在后来写的一篇小说里，我曾把这个细节用进去了。

这样，红岩831理所当然成了815派的死硬分子，用当时的术语说，就是“铁杆”、“钢杆”。几个月后，武斗战火燃遍山城。1967年6月5日后，根据某协议，815的武装力量暂时撤出北碚区，让给对立派“反到底”。这样，红岩机器厂成了孤岛，习惯于坚守岗位的831工人，就成了对方的瓮中之鳖。据当时小报载，1967年7月8日，“反到底”武斗队伍“猛虎团”、西师831等数千人用机枪、步枪、手榴弹、炸药等，对红岩机器厂发动突然袭击，使红岩厂的831惨遭大败。7月25日出版的《815战报》成都版，在“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文章中列举了死者的名单，红岩机器厂计有：黄习琨、吴华明、徐秋林、余春保。后来还死没死，死了谁我已经不得而知。听到消息，扼腕咨嗟之余，我唯一感到宽慰的是：名单中没有过文南，以及那位像采莲女一样的女工。

很多年后，1983年秋天，我有机会第一次去无锡，是开一个技术研讨会。我曾利用会余闲暇时，独自去旧城的寻常巷陌和寂静的锡惠山低徊漫步，寻访早就神往的二泉夜月，和瞎子阿炳悠远旋律带给我的种种遐想与幽思。那一刻，我突然又想起了远在重庆的歇马场，那片孤独的内迁厂，想起那儿曾经发生过的激情、

疯狂和血案。有一刹那，我突然很自责。我对自己说：如果当初我和吴庆举不去那个工厂，不写那几篇大可不必的破文章，不将他们树成典型，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不会成为 8 1 5 的死党的。他们旁边，北碚区，不现成就有一个反到底派的主力“西师 8 3 1”吗？他们完全可能与他们结盟。这样，在 1 9 6 7 年 7、8 月烽火连天的重庆北碚，他们就不会沦为孤岛了，也不会被忽然降临的血洗而死去。

于是我在心里诅咒：该死的《8 1 5 战报》！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